

红军长征初期的教导师

孙 毅

紧 急 组 建

1934年7月中旬，我从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又回到瑞金红军学校担任军事教员。8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房内备课，突然校办派人通知我，说原红军学校校长、现任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请我马上去一趟。我放下手中的教案，顾不得多想，快步赶到位于沙洲坝的军委总部。

叶副参谋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为了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应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中央决定尽快组建一支部队——教导师。”他接着说：“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人员要严格挑选，并要经过正规训练，使之成为一支政治上、军事上合格的部队。”关于教导师的干部，军委已经确定，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参谋长嘛，伯承同志指名叫你担任，我完全同意。今天请你来，是正式通知你的，看你有什么意见？”

我从事部队管理教育工作多年，心里非常清楚，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何况是两位老校长对自己如此信任。我郑重地说：“坚决服从命令！”

叶剑英微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好，你今天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去报到，张经武已到任 20 多天了，他和三个参谋、一个特派员在那里筹建，忙得不可开交。”

教导师的驻地，选在瑞金城西 19 公里高围村附近的刘陈村。高围是个大庄子，由 7 个自然村组成，不远处的云石山，树木繁茂，风景宜人。不久前，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从沙洲坝迁到这里，毛泽东、张闻天就在云石山上祠堂里办公和居住。

刘陈村，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庄。我身背背包，一进村看到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儿童，一打听才得知，村里的男青年都参加红军去了。是一位 12 岁的小姑娘给我带路找到师部的。

在村中一座青砖高墙的大院里，我见到师长张经武。他向我简要介绍了教导师目前的组建情况。

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并保障其安全。有关警卫的业务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领导。为此，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亲自领导教导师组建。他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克服各方面的困难，8 月底完成组建，9 月初开训。

已任命的政治委员何长工，此时还在粤赣军区担任司令员，尚未到职。师部司、政、后机关已初具规模。

我来到司令部值班室，见到作战科长陈奇涵和侦察科长毕士梯。陈奇涵对我说：“咱们司令部的工作从零开始，作战科、侦察科、通讯科、管理科已搭起了架子，并开始运转。”

坐在一旁的毕士梯说：“让我负责供给部、卫生处的

组建 8 月底完成任务。”

当时，师政治部主任李熙还未到任，由组织科长刘汉、宣传科长段德彰主持政治部的工作。由于时间紧迫，我和张经武则集中力量组建部队。在几天之内，地处闽赣地区的瑞金、会昌、兴国、汀州、宁都、于都、石城等十几个县的独立团、补训团和游击队的成员，成群结队前来报到。

教导师编为 3 个团，每团 1700 人，加上师部各直属队 全师共 6000 余人。这些来自土地革命后翻身农民的子弟们 年纪大都在 17 岁至 22 岁之间 个个精神饱满 情绪高昂。我看到这样一支崭新的队伍，心中充满了喜悦。

8 月底，军委从前线调来十几名团职干部，还带来几十匹骡子 从此 教导师组建完毕。教导师正式成立后 立即投入严格而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为日后艰巨的革命斗争作了准备。

告 别 瑞 金

1934 年秋天 红军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 中央苏区根据地也日益缩小。在苏区内，军民吃盐、穿衣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10 月 7 日下午，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乘马来教导师。我和政治部主任李熙赶到村头迎接。在司令部办公室，刘总长压抑着内心的忧虑，镇静地说：“我现在向大家传达中央军委有关红军突围的决定。”接着，他一字一句地宣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屋子里很静，在场的人都不敢随意插话，空气好似凝

固了一般。

宣布命令后 刘总长抬头环视一番 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进行了一年 从军事上说 我军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苏区大部分地区被敌人占领，不好再展开大兵团作战，也不可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怎么办？”刘伯承压低嗓门说：“中央决定红军主力 8 万多人，由中央军委率领突出苏区 打到蒋管区去 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刘总长看了看张经武和我，然后又说：“你们教导师还有一个繁重而光荣的任务，协助中央机关搬运武器、物资，部队要准备负重行军，这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要认真做好。”

8 日上午，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来到教导师检查工作 我陪他到 3 个团都看了看。临走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孙毅 部队即将大转移 你们师又都是新战士 他们的思想一定会有波动，甚至会听到一些谣传。你同李熙同志商量一下，如何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坚定部队战斗意志 减少逃亡。”我点点头说：“叶副参谋长 你就放心吧！”

10月10日 教导师开始出征。

下午 4 时 军号声声 教导师干部、战士全副武装向高围村沙丘一带集合。战士们把五六百担东西，包括用稻草捆绑的三五个人或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的机器部件，大大小小的铁箱、木箱等，暂时隐蔽在集合场外百米处的丛林里。

乡亲们看到这些既无汽车运输、又不用骡马驮载的

笨重军用物品，由自己的亲人以及红军战士背着、挑着、抬着去行军、打仗而惊奇和担忧。有人质问，为什么行军打仗还搬运这么多东西呢？战士成了驮马还能战斗吗？

可是红军战士们坚定地回答：“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再多再重的东西也能把它运走！”

教导师就要出发了，利用沙丘高地当会场，我整理队形，李熙主持会议，张经武讲话，感谢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支持 感谢瑞金地方干部、父老兄弟的热情欢送。

出发号声响了，我宣布行军序列：一团在前，二团随后，三团后卫，师直属队随二团行进。宣布完毕，教导师指战员上路了。

部队已经走出 2 里路了，送行的乡亲们还是难舍难分、拥挤着、流着泪，跟随队伍前进。

走在队伍末尾的我，面对此情此景，情绪激奋。我掏出手巾，擦掉眼角的泪花，匆匆几步，站在一个高台上，大声说：“乡亲们回去吧，不要再送啦，总有一天我们还要打回来的！”我使劲举起双手，向乡亲们告别。

甩掉包袱 轻装前进

教导师经过四个晚上的夜行军，进入敌军控制的赣县、信丰、安远边界，这里即是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部队在信丰休息时，政委何长工由粤赣军区赶来教导师上任。

在行军途中，我负责观察部队行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我还必须要办三件事：一是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二是绘制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

令”三是写出宿营报告 派专人送达上级司令部。

然而一路上，对我来说困难最大的是二排长他们十几个人抬的那个机器部件。有时遇一个大坡，几个小时都上不去，弄得战士们疲惫不堪。在通过大瘦山时，第一团团长方年生亲临现场指挥。因为大雨过后，道路泥泞，坡陡无法通过，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才继续攀登。二排长他们用绳子拴在机器部件上，前拉后推，用了一个多小时，才闯过几十米高的峭壁。

在前方的一个路口，我等候掉队的文团长和二排长。二排长小声对我说：“抬着这么多笨重的机器干什么，将来仗打赢了，占了大城市，还缺这修枪炮的机器吗？那些印票子的石印机其实就是好多块大石头……”

我说：“你不要说啦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这是上级给的任务呀！”

随后二排长站在山岗上稍一定神，突然冒出来一句：“这些笨玩艺 扔掉算啦！”

沉重的负担，直接影响着教导师的行军速度，当然也关系到中央红军纵队西进的战略部署。

一天晚上宿营后，教导师的几位主要领导——张师长、何政委、我和李主任在一起研讨近期行军小结，我把二排长的反映一一转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经过讨论 大家统一了认识。何长工政委说：“由孙毅起草电文，向军委总部发电报，说明抬运机器掉队的人跟上了主力，并请求上级批准，今后再遇危险道路时，把十来个人抬的机器部件，炸毁后丢进山涧里，以保证部队人员免遭伤亡。”

电报发出后，第二天接到军委总部复电“同意教导师的建议”。

教导师进入广东乌径后，接到刘总长布置的战斗任务，接替红一军团向南雄、水口方面担负的警戒任务，要求在该阵地坚守一天一夜，不准敌人前进一步，以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第2道封锁线。

师长、政委和我亲临第一团，和团长文年生共同研究作战方案。文团长于下午4时，几次带领部队向尾追之敌反冲锋。黄昏时分，一团战士和敌人在前沿阵地白刃格斗，有力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受到刘总长的表彰。

接着浩浩荡荡的教导师，进入湘粤交界处的九峰山。战士们手拉手，互相搀扶着往陡坡上攀登。抬着大机器的战士，半天才向上爬几百米。

面临严峻的形势，为了尽量减少非战斗减员，师长、政委找我紧急商量，决定把两人和十几个人抬着的机器全部处理掉，扔到大山沟里。

此决定传达后，战士们拍手叫好。当即打开用草包、草绳、麻袋包裹的那些无法砸碎的修枪炮的机器、印票子的石印机、大型车床……顺山势往下推，滚动的机器部件隆隆作响。

上百个大件处理后，1000多战士从沉重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了。但剩余的400多担装有各种物资的箱子仍由教导师战士挑着前进。

11月初，教导师通过敌军沿粤汉铁路线所设置的第3道封锁线。经湖南的宜章，跨越香花岭，继续向西挺进。

根据军委朱德主席的紧急命令，教导师全速前进，于 12 月 1 日渡过敌军设在湘江的第 4 道封锁线 经广西北部资源县，向湘黔边界的通道县方向进发。

途中 部队要越过 2000 米高的老山界，这里山高路险，行走困难。不少人在老山界上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身子一歪，倒下去就断绝声息。

两个月的行军和战斗，部队减员严重，有的连队失去了战斗力。当翻过老山界之后，教导师 6000 人只剩下一半。

关键时刻 中央政治局于 12 月 18 日在贵州东部边城召开了黎平会议。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议放弃北进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决定刘伯承重回军委总部，担任总参谋长；撤销红八军团、教导师、保卫团的建制 原中央纵队的一、二纵队合编为 1 个纵队 教导师所剩 3000 人 编入一军团、三军团各一半，战士所挑的 400 多担“坛坛罐罐”全部破坏 丢弃在偏僻大山沟和河流里，不致落入敌人之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教导师，向科长以上干部传达黎平会议精神，并安排教导师有关撤销方面的若干事项。刘总长宣布：“张经武调军委分配工作；何长工调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孙毅去红军学校干部团任职；李熙去总政组织部报到；裴周玉去国家政治保卫局……”

教导师行至黔东施秉县境时，召开了全师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传达了中央黎平会议精神。

1935 年 1 月 5 日，是教导师通过乌江的日子。这一

天，教导师要在乌江两岸处理最后一批机器零件。这天天还没亮，我同张师长和何政委就赶到了乌江渡口，等待部队到来。当战士们一字排开，将所剩的 100 余担机器部件一件件投入乌江时，江中顿时发出辟辟叭叭的响声。处理完毕后，部队拉开距离，顺利通过乌江浮桥，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仝玉林 整理）

红 色 上 干 队

莫 文 骅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战斗序列里，有支特殊的队伍——中革军委上级干部队，也称红色上干队。

该队是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前夕，由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和一些地方干部合编而成，学员共 130 多人，均为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上干队属中革军委建制，由红军干部团指挥。当时上干队的队长是萧劲光，政委余泽鸿。1935 年 2 月，由于红八军团撤销，原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我，被派到军委上级干部队任政治委员，于云南扎西到职。上干队下设军事指挥科（科长周士第）、政治科（科长苏进）、地方工作科（科长冯达飞）三个科。其中政治教员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冯雪峰等 5 位老同志。他们名义上是“教员”，实际上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至于上干队的学员，则都是团、营军事、政治或地方县级以上干部。

上干队同志的革命意志特别坚强。有些同志过去曾是统领千军的红军将领，有的曾是身居高位的领导，现在都当了普通战斗员，自己扛大枪，背背包，长途行军、作战，但他们没有一个示弱的。还有的同志曾受过错误路线的迫害，被开除党籍，判处徒刑，但他们的意志没有消沉。我们上干队支部也特别地信任他们，并注意发挥他们的

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董老等 5 位政治教员，年纪大，身体弱，又无马骑，每人拿着一根自己做的手杖走路，平时行军走在中间，有情况时，随伙食担走。当时我们真怕他们出事。而这 5 位老同志有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利用休息或宿营时给学员们上政治课。有时敌机轰炸过后，他们边拍拍身上的泥土，边开玩笑地说：“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惹得大家都笑起来。

有一天，部队在贵州行军时，因山路难走，大家相互间的距离越拉越长。这 5 位同志拄着棍边走边聊，没有注意路标，走错了路。当我们到达宿营地时，现少了他们 5 位，收容队也说没有见到。萧队长和我急得满头是汗，马上向军委报告。周恩来副主席很着急，立即发电报指示各军团帮助寻找。直到半夜，接军委来电，说他们已走到红一军团那里，我们悬在心里的石头才放下来。第二天，一军团派人护送他们回来，大家非常高兴。

长征途中，尽管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受尽磨难，但革命意志没有垮，上干队 100 多名同志除个别同志牺牲外，大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旅程，胜利到达目的地。

上干队虽不是战斗部队，但队员们大都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因而特别能战斗。1935 年 2 月下旬，红军主力为摆脱敌人，在二渡赤水后，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敌军溃逃，一、三军团继续东进，向遵义方向追击敌人。接着，中革军委纵队也向遵义开进，唯有上级干部队奉命被留在桐梓城，其任务是担任警戒，等九军团来接防。

后再向遵义归队。这是长征以来上干队第一次离开干部团单独执行任务。而我队只有百多人，几十条枪，上级暂拨一个警卫连归我们指挥。

桐梓是贵州较大的县城之一，人口上万，商业也比较繁华。我们守不过来，只好把警卫连放在城西，向西警戒；指挥科学员放在南边城外，向南警戒；东北方向接近娄山关天险，没有派部队警戒。队部还有政治工作科 30 多人，地方工作科除一部学员去做群众工作外，尚有 20 人左右，其余就是伙食担子。我们迅速布置好岗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天下午 4 时左右，从北边和南边传来几声枪响，我立即告诉萧队长，迅速把队伍集合起来。正在这时，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军团直属队由南边开进县城。我和萧队长将敌情和我们的任务向他们做了介绍，他们听后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接防。”我看他们带入城的只有人数不多的直属队，便问：“你们的队伍？”罗炳辉回答说：“还有两个团在后边。”这样，我便和萧队长率上干队奔向娄山关。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在快接近娄山关时，忽然，从桐梓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们回头一看，见不远处罗炳辉等率九军团直属队向我们这里奔来，后边有敌人在紧追。罗军团长个子高，身体较胖，穿着一双布鞋，走路比较慢，两个警卫员搀扶着他。他的手枪队也在后边护卫抵抗。敌人越来越近，大声吆喊道：“抓活的！”我感到形势危急，立即同萧队长一起指挥学员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人员接过来。我对他说：“关口由我们

把守 你先走吧！ ”

原来，罗炳辉和蔡树藩率军团直属队到达桐梓不久，其后面两个主力团已绕过娄山关直接向遵义方向开进，他也接到军委通知，要他立即撤离桐梓，赶到遵义。但他率直属队出发将接近娄山关的路上，碰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从旁边插过来，咬住他们不放。若不是遇到我们，其处境是不堪设想的。

敌人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阵地发起攻击。我们利用有利地形，英勇地把敌人阻击在娄山关脚下。那时，原军团一级的队长，作为连长用了；原军师一级的科长，作为排长用了；原是团营一级的干部，作为列兵用了！有枪的学员拿起武器参加战斗；没有枪的学员便拿起棍棒和石头，迎击敌人。敌人见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停止了进攻。这时，中革军委派五军团一个营来接防，并告诉我们，红军主力在遵义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家听了非常高兴，精神振奋。交接完后，我们向遵义前进。

娄山关距遵义约 90 华里，我们于黄昏前赶到遵义城 归还中革军委建制。

当晚，萧队长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娄山关阻敌情况，周副主席听后赞扬我们阻击得好，并给我们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准备占领仁怀县城和茅台镇，以保卫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并为主力三渡赤水做好准备。

当时，红军主力部队正在鲁班场与敌周浑元作战，中革军委离北面的仁怀县城只有 30 华里，而驻地除警卫部队外，再没有战斗部队了。仁怀县城有多少敌人，尚弄不清楚，如果敌人向我首脑机关袭击，那就麻烦了。因我队

在桐梓与敌较量中，显示了战斗力，故中革军委将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队，拨一个工兵连归我们指挥。

过了几天，我军通讯部门获悉：仁怀县城的守敌只有一个连，且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这是我们出击的好时机。

当晚，我和萧队长带领我队和工兵连悄悄直奔仁怀县城。因为夜袭，我们不敢点火，也不能出声，走的是两崖高山夹着的一条小路。路右侧的山下有深涧。一位老乡在前面给我们带路，我们在后面一个挨着一个摸索前进。

从驻地的小村到仁怀，约 30 里路。部队摸黑赶路，竟整整走了一夜。到了城边，部队迅速散开，选择有利地形，迅猛向城内敌人发起攻击。一时，枪声大作，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纷纷向北逃跑。我们没费多大力气，便占领了仁怀县城。我们入城后，一边肃清残敌，一边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同时，奉军委命令留工兵连守仁怀，上干队学员迅速赶往茅台镇，担负护桥任务。

茅台镇是座落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镇，对面也是山，中间有一泓清水河，河面约 10 多米宽，不可徒涉。河上原有简易木桥，人马多不易通过，我们在此基础上架设浮桥，让三渡赤水的红军主力方便通过。

村子旁边有一家酒厂，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厂。据说该酒是用麦子酿造的，有独到的制法，加上清泉水，故芳香甘甜，沁人心脾。为了保护酒家的利益，我们派人监护该厂，不许部队随便进入酒厂。

在茅台护桥期间，我与萧队长和几位老同志去过酒厂。未入厂，一股酒香扑鼻而来，酒厂里有很大的酒池，还

有一排排的酒桶。香喷喷的酒味弥漫厂区。管理人员打开酒桶，让我们每人品尝一小杯，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大家不约而同地赞叹说：“好酒！好酒！简直是玉液琼浆！”为了让广大指战员分享这一口福，我们买了一些酒带回去给大家喝。可以说，我们在茅台护桥三天，饱饮美酒三天。在这三天中，后方的主力源源不断地从工兵连架设的浮桥通过。而敌机每天都投掷大量的炸弹，并向我守桥战士扫射。好在我们事先已有准备，在山边挖了防空洞和壕沟，故伤亡不大。另外，我军的高射机枪手英勇向敌机射击，敌机不敢轻易俯冲下来，投弹不准，故未能断我交通。

我们完成架桥和护桥任务后，奉命离开茅台镇归还干部团战斗序列。临走前，老乡送我们几瓶茅台酒，我们都当作宝贝放在马褡子里，作为在路上解乏之用。

此后，我们随干部团又打过几仗，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上干队为我们党，为我们军队保存了一批精干的力量，这些同志后来大都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这是长征中的红色上干队不可磨灭的功勋。

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方 强

干部团担负光荣的战斗任务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当时形势，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即赫西斯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编为红军干部团。原红军大学改编为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原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为三个步兵营，一、二营培养连排军事干部，三营培养连指导员。原特科学校编为特科营，培养炮兵、工程兵和轻重机枪连营干部。干部团的干部配备是：团长陈赓，团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周士第，政治处主任莫文骅。遵义会议后，我调任干部团党总支书记。

全团教学员工 1000 多人，学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选调上来的优秀排、连、营、团军政干部。主要战斗力就是 4 个营和上干队。

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在长征作战中为全军培养、训练、储备和输送干部；同时，负责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因此，在长征中它的战斗序列为中央第一纵队的第四梯队，由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指挥。先后参加过土城之战、第二次攻占遵义、两

次抢架乌江浮桥，以及强渡金沙江、攻占通安州、警戒安顺场等任务。在行军作战中，部队还不断进行政治形势和任务等思想政治教育及各项军事技术和战术教育，全团的军事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不断提高，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

飞兵巧渡金沙江

1935年4月26日红军进入云南直逼昆明。蒋介石急忙调动7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扑来，而金沙江两岸的敌军却非常空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所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果断地下达了强渡金沙江的命令。

5月2日，中革军委指定：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司令，率干部团“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三军团十三团“亦于4日上午赶到洪门渡架桥”；一军团先头团“4日午前到达龙街架桥”。各路军伪装为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

皎平渡（又名太平渡）位于云贵两省的交界处，是金沙江重要战略渡口之一。干部团的领导决定以第三营及工兵连和电台组成先遣营，另两个步兵营、上干队的特科营为本队。

先遣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团政委宋任穷率先遣营行动，任务是抢占渡口，消灭江岸敌人，搜集船只，组织架桥，以便主力部队渡江。陈赓团长率本队，抢占江北40里以外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之援敌，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五军团顺利渡江。

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军帽上的